

徐广顺 著

XINWENZUJI

XINWENZUJI XINWENZUJI

新闻足迹

序

黄望南

广顺兄是我的同行，也是老朋友，我们相识在全国城市台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此前我们已经以文会友，在我负责的中央电视台理论刊物《电视研究》上发表他的论文，他能提出电视实践中的问题，观点新颖，常有创见，这次在烟台开会，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相见恨晚。会后，我们一同乘火车北上，此时正值初冬，烟台的气候一直很好，温暖如春，不知何故，突然一场大雪，铁路受阻，在烟台滞留了八、九个小时，我们又成了“患难”之交，这倒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互相了解。谈话中得知，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而且成绩很好，这使我惊叹不已，因为我从小对数学不感兴趣，认为学文的人很难走进数学王国，对这高深莫测的学问敬而远之，而对以数学为职业的人怀着一种神秘感，总认为他们的脑瓜有点特殊。广顺如何走上新闻工作岗位，还搞了几年电视，更增加了了解他的兴趣，以后我们交往更多，常有电话联系。

广顺调沈阳电视台以前，曾在沈阳日报工作十余年，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十二年前开始干电视，纵观他二十多年的新闻足迹，我看他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象什么，在报社他是沈阳的名记者，有一段时间在报社的印刷厂当厂长，

他取得的管理经验让全国的同行们瞩目，干电视以后又能很快熟悉业务，取得出色成绩。我一直认为干电视这一行不容易，不是什么人都能干好的，要有一点悟性，广顺就有这点灵气，其中的奥妙就是他善于总结经验，努力探索电视节目制作的规律，领悟现代传播的真谛，因而无论是任总编室主任、经济部主任还是新闻部主任，都能把工作作得很好。有的人把电视工作看得很简单，似乎谁都可以搞好，认为与耍笔杆不同之处不过是多了一台摄象机。实际上就是这台摄象机却表现出电视的本性：声画一体。由此产生出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掌握了它，就象在海洋里可以自由游泳，否则就会被激浪冲打得晕头转向，干了多年仍不见成效。

电视的现场性与时效性决定了干这一行的紧张性与紧迫感，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很少有时间能坐下来冷静地思索，整天忙于拍片、编辑、播出，因而有的人虽已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电视记者，却拿不出高水平的理论文章，直到要评职称时，才临时抱佛脚。其中尽管有工作忙的原因，主要还是有一个对电视理论认识的问题，不理解它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后劲不足，就是缺乏理论的底气。广顺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他不仅要自己采访、制作节目，而且要带领一批人完成突击性任务，指导他们做出优秀节目，并且不断总结经验上升到理论，十余年写出了十多万字的理论文章，这本文集就是最好的说明。

广顺的理论文章都是有感而发，最突出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他的文风，也是和电视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如谈话节目是电视播出的重要形式，需要不断改进，他在总结了沈阳台播出的一系列此类节目后，提出“变单项灌输式为双

方交流的协商式”，符合电视的参与性这一重要特征；针对要注重屏幕的社会效果和电视特色问题，提出节目编排要有“屏幕意识”，“要重视对电视社会功能的研究”；其它还有加大信息量、增强经济报道的力度，拍好新闻首先要定好主题并认真提炼……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见解，颇有新意。

近十年来电视在中国得到飞速发展，节目制作水平不断提高，这首先是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摄象一体化设备和数字特技的普遍使用为节目制作开辟了新的天地。电视不同于其它传播媒体，它是建立在现代电子技术的基础上，电子技术的发展决定着电视艺术的发展，于是出现了新的电视文艺形式——MTV，纪实性作品成为时尚。新情况为电视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要求理论家给以理论上的说明，首先要求电视实际工作者思考，用怎样新的手段和表现方法，去更加深入、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难以达到这种要求。

中国的电视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电视工作者的努力，才能建成这一宏伟的大厦！

1995.6.30·北京

目 录

序	黄望南
新闻足迹	(1)
倾听观众呼声增强屏幕意识	
——谈谈如何办好电视节目	(18)
口语新闻在电视节目中的作用	(22)
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24)
浅谈电视节目的编排手法	(27)
宣传的龙头、管理的枢纽	
——浅谈电视台总编室的职能及其作用	(31)
关于新闻题材和主题提炼的思考	(38)
关于经济报道的问题及其对策	(44)
电视栏目化播出的优势	(50)
抓好问题新闻强化舆论监督	(53)
浅谈有线电视	(56)
简议电视专题节目的解说词	(61)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63)
改革给沈阳电视台带来活力	(68)
沈阳电视台在改革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	(78)
有偿服务与经济专题初探	(85)
《职工与领导对话》专题报道评价	(91)
对拍摄电视片《老沈阳人的叙说》后的思考	(100)

沈阳公安干警迅速抓获通缉全国的四名犯罪分子

.....	(104)
“遗体捐献”引起的思考.....	(105)
农民出国新时尚, 不带大件捎项目.....	(108)
合资: 两个企业, 两种结果.....	(110)
《寻找回来的世界》获好评.....	(114)
独具一格, 别有滋味	
——木偶电视连续剧《岳飞》观感.....	(116)
《新星》有新意.....	(118)
大胆的尝试与探索	
——浅谈电视连续剧《新星》的旁白.....	(120)
警惕经济改革激流下的《潜流》.....	(122)
清新活泼的乡土情	
——说说电视音乐片《东北风》.....	(124)
高度发挥对话的功能和作用	
——浅谈《坎坷》、《卞卡》的艺术手法.....	(125)
电视为啥出现误点.....	(127)
为“鸣谢”说句话.....	(129)
灵魂的交流, 心底的沟通	
——谈谈电视讲话节目.....	(131)
编辑出版《温馨一缕》的思考.....	(133)
南方学习、深化改革	
——沈阳电视台南方学习考察后的报告.....	(140)
电视与电视报.....	(153)
大东区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初步解决.....	(155)
不要等四化, 要干四化.....	(157)

科研成果数不完	
——老沈头游沈阳的见闻·····	(159)
祝希娟在深圳·····	(163)
《驼龙传奇》驼龙的扮演者谷文月·····	(164)
从拳术冠军到屏幕新星	
——记《海灯法师》中薛久志扮演者吴云华·····	(165)
清朝足球队的“绝活”	
——影片《京都球侠》拍摄散记·····	(166)
市电视台、电影公司合办“沈阳银幕”受欢迎·····	(168)
一股股带来生机的活水	
——电视剧《新闻启示录》中的台词·····	(170)
人民必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亚战场纪实·····	(172)
后 记·····	(195)

新闻足迹

人总是要行路的，既行路则必然留下自己的足迹。

因为走路的不同，所以每个人也都必然留下不同的足迹。

光阴若水，白驹过隙。屈指算来，自己在新闻之路上已艰辛地跋涉了二十六个春夏秋冬。回首往昔岁月，忆念自己走过的新闻之路，心中颇多感慨。欣喜与憾然相互交融。心中的喜悦自然来自成功的方面；心中的憾然则来自自己的不足与缺憾。而今，在“知天命”之年，站在人生的一定高度，俯瞰自己二十六载深深浅浅、曲曲弯弯的新闻足迹，仿佛可以看到自己在不平坦的新闻之路上奋力跋涉的脚步；闻到那脚步的铿锵之音。

足迹，是一个人成长的痕迹与见证。人生之路千万条，然而，其足迹大致也有轻浅的、歪邪的与闪光的。我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追求那闪闪发光的人生足迹。

人生往往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我原来是学数学的。一般来说，数学似乎与新闻与舞文弄墨风马牛不相及。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真正干起了舞文弄墨的行当，成了谓之“文人墨客”中的一分子。

其实，真正的我确实与舞文弄墨有不解之缘。

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小说。小说中那些具有英

雄色彩和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着我。特别是在中学和高中时读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和普希金、高尔基、托尔斯泰、果戈里以及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后，使我更被书中典型人物形象的感染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所启迪。也使我产生了对文学艺术的向往与憧憬。那时，我也时常萌生长大当作家的念头。我在那时也的确做了些舞文弄墨的事儿：充当学校墙报的“编辑”，主持“文艺晚会”，还破颜登台朗诵诗歌、说山东快书……然而，由于家庭亲友的直接干预，也因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论调的影响，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总是很管用的；社会“思潮”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左右也是很大的。1962年我竟鬼使神差地、违心地报考了大学理科。因“文革”闹剧的影响，1966年本应大学毕业的我，却延缓到1968年才予分配。

这次分配，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它决定了我一生将从事的专业。

可能也是鬼使神差，或是命运的安排，我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沈阳日报社。

分到新闻单位这从亲友们对我的衷心希望来说是背道而驰的；但从我自己真实的情趣和愿望来说，又毋庸置疑是夙愿以偿。

1968年，我告别了我的学生生活，从此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从那时开始便留下了我在新闻之路上从蹒跚走向稳健，从轻浅走向坚实的一行又一行的足迹。

来到沈阳日报社我被分到编采部。初来乍到，又非“科班”，使我觉得什么都很难。大概我天生性格中就有自强不息，

不甘人后，甚至独领风骚，标新立异的因素。因为新闻基础理论知识知之甚少，就必须尽快掌握更多的新闻基础知识；因为“笔杆子”对我很生疏，所以，必须尽快熟悉“舞文弄墨”，尽快提高文字功夫和文笔能力。我以一个新兵的姿态，虚心求教“首长”与“老兵”，并以他们为“师”。求“传道授业解惑”之法，以求尽快进入角色。

白天，车水马龙，我奔走于工矿企业试学采访；晚上在昏黄的台灯下，或埋头苦读新闻基础理论书籍与有关资料；或勤学苦练新闻写作。

那时，我用蹒跚的脚步，留下的是一行弯曲而浅淡的脚印。然而，那却是我的第一行脚印。第一行脚印是珍贵的，也是最难忘的。

也许是学数学的原由，其思维方式更具逻辑性，更益于循序渐进，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于刻苦努力，我很快熟悉了新闻这门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摸索到了新闻一定的规律性，初步掌握了新闻各种体裁，诸如消息、通讯、评论等写作要领。接触了大量稿件，从中体味、揣摩、感悟了许多“规则”与“规律”的东西。从而，对编辑稿件心里也有了“总谱”，甚至有了些“精髓”上的把握。来沈报几个月后，我采写的一篇三千多字的人物通讯《越苦越要上，越险越向前》和一篇在一版头条发表的消息后，受到领导和老编辑们的好评。这对于老记者、老编辑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对我这个“徒工”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以后，我被调到政教部担任《党的生活》专版的责任编辑并负责党建工作的宣传报道。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担当专版编辑。这就要求自己不但要组稿、还要自己采写

新闻。我深感工作份量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告诫自己：“宁做龟行，不为兔缩”。并下决心横竖要把这摊工作干好。白天进厂、下乡采访；晚上住在报社编稿、写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较好地完成了每月二期《党的生活》专版和党建宣传报道的任务。这对我一个初踏新闻之路的新兵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或许我命里注定总与“官”有点缘分；或许自己的组织领导能力能被人所认可。读书时我就担任班干部、学生会干部。1978年我被任命为沈阳日报政教部副主任。从此，我似乎便与“新闻官”有了缘分。担任政教部副主任后，我负责组织了全市青年在报纸上开展对理想、前途的讨论，我在三个月中编辑见报的来信、来稿二百多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1979年，为促进解决社会反响强烈的“看病难”问题，编委会要求宣传好大东区卫生局发展区街医疗事业的经验。我带几名记者到十几家卫生院采访，发表了《大东区看病难问题初步解决》和评论《不要等四化，要干四化》以及大版面的画刊。这组报道由于宣传的集中突出，当时对推进我市区街医疗事业的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改革科技报道，解决“技术性强，读者难懂”的问题，在总编辑刘黑枷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带记者采访了十几家科研单位，开辟了《科研成果数不完——老沈头游沈见闻》的专栏，对四项科研成果，采取形象的比拟手法，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构成一组报道，受到读者好评。

新闻人诸多要素中第一位的要素应具有新闻的敏感性。有了“敏感性”，才能抓住有价值的，甚至是重大新闻。吃“新闻饭”的如这种敏感性不强，即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

地步，是不会“取胜”的。我特别注意这种“敏感性”、“敏锐性”的培养训练。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是突击入党的典型。这根敏感的新闻神经牵动着，我决定抓一抓这个“典型”。在当时的沈阳日报总编辑赵阜的支持下，我几下沈阳农学院（现在的沈阳农业大学）、兴城市、枣山大队等地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写出了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发表在《沈阳日报》一版。尔后，《辽宁日报》全文予以转载。

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掌握好理论，才会有更好的实践。这个时期，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和中国文学史，使我的政治理论与新闻理论水平又有了较大的提高。自己的“新闻头脑”愈加丰富起来。

1970年至1974年我在沈阳日报总编室出版组任国际时事专版的编辑。国际时事版的编辑需要夜晚工作。如此工作一干就是五年。五年夜班工作，困难实属很大。特别是孩子尚小，家庭负担重，更需要我克服种种困难，才能把工作干好。在这里我熟悉掌握了编排各种形式的报纸版面和解决成版中的疑难问题，同时，对美化报纸版面，更好地体现报纸版面语言以及熟练地掌握制作、提炼标题的技巧，并对这些“本领”也有了独到的见地。经勤学苦干我较好地完成了国际时事版每天一版的文字编辑和版面编排任务。

在沈阳日报从事新闻编采十四载，在我的新闻实践之路上留下了一行行从稚嫩到趋向成熟，从轻浅到趋向坚实的足印。

人生之路往往会有偶然性的转折与变化。这种“偶然

性”的结果往往还具有颇重要的意义。我的确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迈入沈阳电视台大门的。那时，沈阳电视台刚刚建台，人员编制很少。所以进入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几经市委有关部门的协商协调，我才来到沈阳电视台。

从报社到电视台，从报纸到电视，从版面到画面，尽管这条路对我是陌生的，但我仍执着而坚定地在这条新路上勇敢地探索，奋力地跋涉，迈出我的新足印。

来到电视台，第一步就迈进了总编室，并负责总编室的工作。新闻单位的总编室乃新闻播出的枢纽，新闻业务的中心部位。它既要当好宣传管理的龙头，又要协调平衡好各业务部门的关系。负责如此之重要部门，对我初涉电视的“门外汉”来说无疑困难和困惑都是不少的。同时也觉得又是对自己的锻炼与考验。我生性要强、执拗，不论做什么，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和阻力，也一定要去做，且要做得出色，不然我就索性不做。作为总编室主任，既要担负电视宣传的一定的宏观指导任务，又要负责具体业务的微观指导工作。在任期间，概括起来大体做了五项工作：

制定宣传计划。遵循电视工作的规律，科学合理地编排电视节目。每一季度总编室提出全台宣传计划，除重点抓好新闻报道计划外，对各种专题性节目，以及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各种文艺节目也都拟定播出计划。为建设精神文明，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总编室组织播放了反映周云成救儿童英雄事迹的电视《时代之子》；为配合整党工作，组织播放了电视剧《刑警队长》、《走进暴风雨》、《血总是热的》；为宣传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组织播出了电视剧《新星》、《潜流》、《新闻启示录》、《大树底下》、《女记者的话外音》。这些紧密

配合形势播出的电视剧和电视节目发挥了宣传的导向作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强化宣传管理。电视是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随着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要搞好电视宣传，就须臾离不开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我组织制订的《宣传计划管理制度》、《审片制度》、《节目播出制度》、《节目送审制度》、《编辑岗位责任制》、《磁带库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对保证优质安全播出起到了根本的保障作用。

组织开辟节目源。“大播出量与小生产量”的矛盾是城市电视台始终面临的共同矛盾、突出问题。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办法：一要靠提高自身生产制作电视节目的能力；二要靠与全国各城市电视台携手合作，互相交流，以扩大播出节目的来源。那时沈阳电视台刚刚建台，人财物紧缺，自拍自制节目微不足道，交流节目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我率总编室节目组的同志奔赴全国各地的城市电视台走访交流。记得我是5月1日进台，5月11日便开始率队南征，与南方各城市电视台广泛接触交流。就在我“南征”期间，年逾八旬的高堂老母病逝，家里人到处找我也未找到。后来我知道消息后悲痛至极，泣不成声。

“南征”是我第一次出去与南方各城市电视台走访交流，建立友谊。在我担当总编室主任的六年间，为了我台的“生命源泉”，我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走遍了全国城市电视台。“天时、地利、人和”，我更注重“人和”的力量。我们用真诚、信任、合作与友谊与全国许多城市电视台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结交了许多知心朋友。这种真诚友谊的建立，为沈阳电视荧屏的丰富多彩起了重要的作用。我

们与全国一百多家电视台建立了节目交换关系，基本解决了节目的来源。

说起节目源，至今仍令我难忘与兴奋的是电视连续剧《霍××》在我台的播出。当我得到南方某电视台正在播放这部电视连续剧且有这部片子的信息后，快速签订协议，购买了此片的播映权，由于急待播出，锻炼我台译制队伍，我们又快速组织人员译文、配音、制作，快速将此片编排在黄金时间播出。顿时，荧屏“炸”响了，沈城轰动了。无论妇孺童叟每天按时端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观看。这部剧牵动了沈城的千家万户。据调查，此剧播出时，沈城大街小巷的行人也寥若晨星。足见这部剧的收视率是何等的高啊！《霍》剧的播出，使刚刚建立不久的沈阳电视台打响了头一炮。即使至今，沈城观众一提到沈阳电视台还忘不了提到这部剧。

1985年我台与南京等几个主要城市电视台共同发起，组建了全国城市电视台节目交流中心，为我台和其他兄弟台的节目源提供了组织系统的保证。

严格审片制度。有了节目，能否播出，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为此，我们制定了节目审查标准。首先要注意节目的内容是否符合中央和省市委的宣传口径和能否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其次要注意节目的艺术水准是否健康、文明、高雅；再次要注意节目质量是否达到播出的技术标准。这三条审查标准，实际上就是节目把关问题。1984年，总编室已编排了当时的“风云人物”、石家庄某厂厂长的报告，当时我出差在外。回来后得到这一报告暂不能播的消息，及时请示市委后，立即撤掉了这个报告的播出，及时地避免了一次政治事故。为此，台里特发通报加以表扬。通过此事，使我深深

认识到，电视宣传要符合变化的宣传精神，使之始终与中央的和省、市委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

组建评论队伍。新闻评论既是电视台的旗帜，也是旗帜鲜明的新闻舆论导向。要增强新闻宣传的力度和深度，抓好电视评论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在观众中仔细筛选，最后拟定了沈阳市电视评论队伍，为沈阳电视台的电视评论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些做法受到省、市委宣传部的的好评。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辽宁省群众性新闻评论工作现场会”上，我代表沈阳电视台作了《倾听群众呼声，办出有沈阳特色的电视节目》的发言。后来，这个经验还分别被刊登在新闻专业刊物《编采之友》和《辽宁广播电视》上。

俗语道：无巧不成书。在节目交流中曾发生几起十分奇巧的事儿，不妨算做节目交流中的花絮，在此一录。1983年12月，武汉台拍摄的单本电视剧《父亲》，在他们还未播出的情况下让我台首播。但播出日期迫近，片子还没有拿到。经联系武汉台派文艺部主任将片子送来。不巧，当天武汉没有飞沈阳的直达班机。武汉的同志只好从武汉飞到北京，到北京欲再乘机来沈。可惜出来时太急，忘了带介绍信（当时介绍信还具有权威性）。无奈，这位武汉的同志只好东闻西闻找到北京电视台，拿到介绍信后才买到飞机票。飞机为了等这位“不速之客”竟破例延长1小时起飞。武汉的同志乘坐的飞机到沈已是晚5时多，而当晚6：30就要播出了，当我们的车接到武汉送片的同志后，风驰电掣般飞驰到沈阳电视台，正赶在了播出之前，一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总编室六年来，我们以真诚与热情与全国很多的电视台的同行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要丰富沈阳的荧屏，就要开

辟广阔的节目源。全国不论那个兄弟台来人到我台交流节目或办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节目的源泉和渠道，我们就像兄弟般地接待他们，与他们建立友谊与合作关系。记得1985年腊月三十，长沙电视台一位同志来我台交流节目，因台里都放假了，我就把这位同志请到家中，与他一同欢度除夕夜。当我们一起吃上热腾腾的饺子，听着窗外噼叭作响的爆竹声时，长沙的同志感到无比的温馨，仿佛似在自己家过年一样。

在我任总编室主任期间，总编室连续四次被评为电视台先进集体，有一名同志被广播电影电视部评为先进工作者。

正当我聚精会神，专心致致于总编室工作时，台党组决定我离开总编室，组建经济部。

作为一个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作为一名党员应以服从党的需要为职责。尽管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也没有徘徊、犹豫，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新任务。并坚定地向党党组表态：尽管困难很多，我也一定要把经济部的工作干好。

经济部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经济部新组建必“万事开头难”。我深感肩上的担子之重。经济部构成人员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被解聘的人员。我觉得若要尽快打开经济部工作的局面，首要的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更大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把他们都变成闪闪发光的“金子”。不仅如此，还要通过科学管理，创出更多的经济效益。我开始建章建制，制定政策，使部里工作逐渐走入正轨；我还与同志们一起研究拍摄专题片的选题，并自己写分镜头和解说词，经一番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部里各项工作都开展得井井有条。

经我与同仁们的团结奋斗，经济部圆满地完成了经济宣